

武侠小说指掌图

袁良骏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侠小说指掌图 / 袁良骏著 .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 2003.1

ISBN 7-5011-6055-4

. 武... . 袁... . 侠义小说 - 文学研究 - 中国
. 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4474 号

武侠小说指掌图

袁良骏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xhcbs.126.com>

中国新闻书店: (010)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80毫米 × 1230毫米 32开本 9印张 插页18张 180千字

2003年1月第一版 2003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055-4/I · 339 定价: 22.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10-65895562 65897685

出版前言

十年磨一剑，
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示君，
谁有不平事？

这首唐代诗人贾岛所作题为《剑客》的诗，极其凝练地刻画了一位仗义行侠、敢于打抱不平的侠客形象，其豪气和侠气跃然纸上，实际上抒写的是诗人自己的胸中之志。

20世纪80年代以来，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的“新派武侠小说”风靡神州，其剑胆琴心、侠骨柔肠，其浓厚的书卷气、丰富的想像力，俨已冲破通俗小说之藩篱，不仅倾倒了无数大众读者，连大学教授、知识阶层也席卷其中，甚至作为一门学问走上了大学课堂，“武侠热”一时蔚为壮观。

这一文化现象引起了一些有识学者的关注，并从

不同的角度予以专门的研究。袁良骏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学者，以研究鲁迅和港台文学闻名。集多年对武侠小说之观察，近年又进行了细读式系统研究，写成了《武侠小说指掌图》一书。

所谓“指掌图”，借自武侠。说的是武侠中人，指为指，掌为掌，或以指胜，或以掌赢，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本书辨析阐释侠义小说、武侠小说、新派武侠小说的源流、传承、蜕变关系，梳理其发展流程，尤其对武侠小说的成败、得失、利弊提出了独到见解，不失为一家之言。

新华出版社

2002年12月

《武侠小说指掌图》序

吴小如

袁良骏兄近年来颇致力于武侠小说问题的研究，其研究目的是力求给予武侠小说以公正合理的评价。但武侠小说是我国古今小说作品领域中的一个分支，而且其具体内容又是负面影响远远超过值得正面肯定的内容的一个分支，因此研究的结论往往很自然地就把这类小说作品归属于被否定的范畴之内了。其实这样的评价并不算错，而且应该说还是比较公平合理的。但近来吹捧武侠小说的风气甚嚣尘上，于是良骏兄的一些评论武侠小说的文章就每遭物议，甚至歪曲了良骏论点的原意。基于在这种学术风气笼罩之下，良骏乃有《武侠小说指掌图》之作。从书名的标题看，仿佛这只是普及武侠小说一般常识的读物，实则此书的真正主旨还是为了阐明良骏本人对武侠小说的一贯看法的。此书脱稿后，良骏曾寄来部分章节让我先睹为快，其中不少论点原是他近年来的一贯主张。作为一个热心读者，对这些论点可以说我早已烂熟于胸中。

不久前良骏来信，嘱我为他这本大著写篇序言。我和良骏相熟已四十年，我又忝为一日之师，他这个要求我当然义不容辞。而且借此机会，我也想谈谈自己对武侠小说的粗浅看法，以就正于当世治武侠小说的专家们，也算是一举两得吧。

我想先从文体名称的界定说起。我以为，旧时称为侠义小说者与今之称为武侠小说的作品并不完全相同。除了“侠”是共同特点外，侠义小说的内容多着重在“义”的方面，即所谓“行侠仗义”；若从反面说，则为“多行不义必自毙”。而今之所谓武侠小说，“义”的比重乃大大缩小了，更多的篇幅大都放在“武”的方面。不仅着力描写武技，而且有的还异化为法术和剑术，以及利用各种致人死命的毒器和狠招（“招”字实应作“着”，即“棋高一着”的“着”，因声调变化而改写为“招”），而这些施展法术者也就由平常的“凡人”转而成为“超人”，乃至把社会背景也变成“神仙”或“魔怪”的世界了。至于“义”与“不义”，早退居于次要地位；当然“义”的装潢还是需要的，但只不过是一种点缀而已。此外更有一个重要差别，即旧式的侠义小说每与公案故事搭界，侠客们多帮助“清官”除暴安良，平反冤狱（当然他们同时也为官府镇压反抗统治阶级的起义者），故又统称“侠义公案小说”。而今之所谓“新武侠小说”，“侠客”

们已基本上同“清官”脱钩，而改为附丽于最高统治者（如蒙古国王或清朝的康熙皇帝）了。说句难听的话，“侠客”们的本质已从官僚的“鹰犬”上升为国王或皇帝的奸佞宠臣和权豪势要了。

再从传承关系来看。今日之谈武侠小说者，总要追溯到《史记》的《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我昔年谈《三侠五义》及今日良骏兄撰写本书，亦皆不例外。其实《史记》里所描写的人物如聂政、荆轲、朱家、郭解，虽带有传奇色彩却仍是一些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十分平淡无奇的普通人。他们诚然具有“士为知己者死”的牺牲精神，却没有一个能飞檐走壁、出没无常的。而出现神人、仙人、奇人、异人以及具有特异功能的“超人”或荒诞离奇、神乎其神的妖魔鬼怪（包括能变成白衣素女的善良的田螺姑娘），乃始于六朝志怪故事，至唐人传奇则有更巨大的发展变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到了清末民初，以迄半个多世纪前，大抵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直到今日，包括那些一写起来就没完没了、无尽无休的《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之类和至今犹在大量读者群体中热火朝天不胫而走的金大侠《全集》，书中所见到的几乎没有几个离不开人间烟火的“凡人”，除了“超人”就是“异人”，而普天之下，也到处是他们活动的领域。而这些人的武艺、剑术乃至法术亦愈演愈奇，甚至连孩

子们看的科幻作品如《哈里·波特》也望尘莫及，远不如那些武侠小说离奇怪诞。我想，爱读这些荒唐怪异武侠小说的读者，其欣赏水平究竟与对卡通画着迷的幼儿园小朋友孰高孰下，似乎也很难判断了。

文学作品不论优劣良莠，实际都是现实社会形形色色世相微缩的折射投影。自从以《封神演义》为代表的神魔小说大行其道，明明是殷周两个王朝因失道与得道而产生的政治斗争，却硬要塞进阐教与截教两个教派之间“正”与“邪”的斗法。这就给后世武侠小说中帮派斗争开了个不良的端，成为“始作俑者”。这种看上去似乎“神通广大”的斗法故事乃逐渐演变发展为武侠小说中为其作者们津津乐道的宗派主义（包括宗教、武林、帮会等等之间的不同派别）、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终于发展为黑社会）的斗争故事，而这种种斗争故事既成为所谓“新”武侠小说里必不可少的曲折情节，当然也就成为它们必不可少的“新”的特色。这实际上就是自古到今社会上朝野间的党同伐异，官场上的相互倾轧，军阀割据势力间的明争暗抢，以及黑社会“老大”们“黑吃黑”与黑白两道之间的你死我活种种矛盾斗争的折射与缩影。但出现在“新”武侠小说中的这些明争暗斗的描述，并未得到它们的作者的否定或批判，而且反而推波助澜，借此吊起读者的胃口，使读者急于看到下文的结果。

于是这一类帮派斗争的情节乃愈演愈烈，火上浇油。回顾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现状，本已长期处在水深火热，民不聊生，颠倒黑白，矛盾重重，动荡失衡的民族危难之中。在这种局面下，绝大多数武侠小说的作者们（当然我指的不是全部）不仅不去激励民志（即使有点冠冕堂皇的正面说教，也是“劝百而讽一”），从积极方面引导民心走健康向上、团结爱国的正路；相反，却让广大读者放弃正当的理想而耽溺于荒谬的幻想，把久已凌轹浮躁的心态鼓动得更加迷惘错乱，认为只有“超人”的法术和剑术才能给人以精神上的寄托与慰藉。古人讥弹某些自暴自弃者为“玩物丧志”，而今天不知有多少被武侠小说的内容牵着鼻子走的读者，却在“玩”由剑术与法术所编造的荒诞之“物”而丧失掉具有一颗平常心的凡人的做人之“志”。如果从这个视角来审度武侠小说的功与过，则有些专家学者（包括良骏在内）对武侠小说做出较为严肃和严厉的批评，恐怕也在情理之中，而不能算是杞人忧天或以个人的好恶为转移吧。

从我个人读武侠小说的过程来进行反思，也是走过一段曲折弯路的。我是从读小说三四年级时开始读《施公案》和《三侠五义》的。（同时也读了《水浒》和《三国演义》，那恐怕不算是武侠小说吧。）到初中时，所谓“南向北赵”的作品已读得差不多了。始而

觉得这些书里的故事情节很好玩，有一定的吸引力；及至读得愈多，愈感到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便产生了厌倦心情。最终乃觉得这不过是一堆堆文字垃圾，深悔少年时代为之浪费了多少时间精力。马克思主义者曾斥责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读武侠小说如果着了迷上了瘾，实际上跟吸毒的瘾君子 and 废寝忘食不惜倾家荡产的赌徒并不相上下。我后来逐渐把兴趣转移到“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作品和汉译世界文学名著上来，总算把武侠小说的瘾戒掉了。由于自己也是从武侠小说的旧“营垒”中“走”出来的，因此对它们多少有了些理性上的分析和辨识能力。现在姑且把这点滴不成熟的看法写出来，勉强供读良骏这部大著的广大读者充作参考资料。当然这只是“一孔之见”，连“一家之言”都够不上。倘专家学者们对鄙见加以讥讪乃至进行无情批判，好在我已做好充分精神准备，甘愿低首下心地敬聆尘教。

2002年11月11日在沪郊
写讫，12月9日修改二稿

目 录

出版前言	1
《武侠小说指掌图》序	吴小如 1
绪论：武侠小说的历史评价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侠义精神与侠义小说的滥觞	38
第二章 侠义小说在唐传奇中绽放异彩	48
第三章 说话艺术促进了侠义小说的发展	71
第四章 《剑侠传》、《续剑侠传》和剑仙 小说的神魔化	83
第五章 侠义小说的高峰：《儿女英雄传》 与《三侠五义》	97
第六章 侠义小说向武侠小说的蜕变	106
第七章 《江湖奇侠传》、《火烧红莲寺》 与武侠狂潮	119
第八章 平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	129
第九章 顾明道、姚民哀等“南派”武侠	140
第十章 “北派”武侠先锋赵焕亭	

	《奇侠精忠传》	152
第十一章	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剑仙神魔化 之集大成	162
第十二章	白羽《十二金钱镖》	180
第十三章	王度庐《卧虎藏龙》	190
第十四章	“北派”武侠郑证因、朱贞木	200
第十五章	金庸、梁羽生与港台“新武侠” 的崛起	211
第十六章	“新侠客派”梁羽生	218
第十七章	“新剑仙派”金庸	235
第十八章	“金梁”之后	257
跋	273

绪论：武侠小说的历史评价

武侠小说的历史评价问题，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愈来愈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有学者统计：自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共出现武侠小说作者约200位，共出版武侠小说作品约千余部，总字数则超过3亿。而自1954年梁羽生（陈文统）先生在香港《新晚报》发表《龙虎斗京华》开始，以梁羽生、金庸、古龙、温瑞安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武侠小说作家，又开创了武侠小说的新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并未明令取缔武侠小说，但自从第一次文代会（1949年8月）起，它便被打入了另册。它的创作、出版、发行、借阅一概停止，武侠小说实际上断流了。改革开放之后，梁羽生、金庸等的“新武侠小说”蜂拥而至，成为热门书、畅销书。特别是“金庸热”一浪高过一浪，征服了千千万万的年轻读者。内地的一些作家、文人，也开始了“新武侠小说”的创作。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一些影响较大的旧武侠小说（诸如平江不肖生、赵焕亭、李寿民、宫白羽、王度庐、郑证因、朱贞木等人的一些作品），也都得到了再版

袁进《鸳鸯蝴蝶派》，上海书店1994年8月初版。

机会。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图书市场，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武侠小说的热卖高潮。一个出版、发行、阅读的高潮，不可能不相应地出现一个推荐、评论的高潮。仅以金庸小说的评论为例，不包括单篇论文，仅各种名目的专著、专集、传记即出版不下数十种，而对于武侠小说的总体评论，不包括武侠系列丛书或单本武侠小说的出版前言之类，也不算《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词典》，单是专著，就我所见，也出现了如下四种：

1) 《武侠小说话古今》 梁守中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香港三联书店 1986年初版

2) 《中国武侠小说史略》 王海林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8年初版

3) 《中国武侠小说史》 罗立群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年初版

4) 《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 陈平原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年初版

有些研究民国通俗文学的著作，如张赣生的《民国通俗小说论稿》之类，对武侠小说的论述也占了较大比重。这些论著的出现，为武侠小说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但也存在着一些误读和混乱，需要进一步加以厘清。

宁宗一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3月初版。
重庆出版社1991年5月初版。

一、侠义精神与“江湖义气”

无论中外古今，侠义精神都是人类的美好天性之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危济困，除暴安良，为国家民族更不惜赴汤蹈火，英勇献身，历来被人们传为美谈。而对于具有五千年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而言，更有着丰厚的侠义资源。以儒、墨、道、法四大思想哲学流派为代表的先秦诸子中，几乎无一不涉及这一命题。墨家被视为“侠”之源头，他们主张“摩顶放踵，利天下”，自不必说；儒家讲“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孟子），这里的“仁义”和墨家的“侠义”有很多契合点。即使道家的包括圣、勇、义、知、仁在内的“道”（庄子），也对侠义精神做出了积极提倡。对侠义评价较低的是法家，他们认为“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但即使法家，批评的也只是“侠以武犯禁”，即“侠”容易闯祸，容易触犯法度、刑律，而并未否定侠义精神本身。

到了太史公司马迁笔下，则对侠义精神做出了生动描绘和高度赞扬。在《史记》中，他破例写出了《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将侠义精神的体现者——以荆轲为代表的古代刺客和以朱家、郭解为代表的汉代游侠与公侯将相并列，对他们进行了热情讴歌：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
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

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列传》）。

在司马迁看来，荆轲一类的大侠早已“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了，而朱家、郭解一类的闾巷之侠、布衣之侠、匹夫之侠、平民之侠却仍是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的：

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网，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欺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游侠列传》）。

在另外一些篇章（诸如战国四公子平原君、信陵君、孟尝君、春申君等的列传）中，对侠义精神的赞颂可谓一以贯之。其实，我们不妨说，太史公本人正是顶天立地的亘古大侠。为了“李陵事件”，他遭到汉武帝误解，判了腐刑，遭受了奇耻大辱。他之所以忍辱含垢、“苟且偷生”，完全是为了自己尚未完成的《史记》这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大著作。只要这部著作能够完成，可以“藏之名山，传诸其人”，自己则万死不辞。司马迁的这种“忍辱偷生”，完全是一种忘我的、伟大的牺牲精神。他的“忍辱偷生”和屈原的壮烈自沉具有同样的不朽价值。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孤立地、抽象地看侠义精神是可歌可泣的；放到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去考察，侠义精神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社会的发

展，时代的前进，靠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即广大人民群众辛勤劳动。而社会的稳定、人民大众的安居乐业，则要靠法治精神和相应的道德规范来维护。在这个大的前提下，侠义精神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否则，它很可能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反作用力而产生消极影响。稍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无论是秦的统一中国，还是汉、唐的高度强大，无不如此。即使像近代日本那样靠“武士道”精神推行侵略扩张的国家，其强大首先靠的还是“明治维新”，废除了落后的封建制度，高度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韩非子的“儒以文乱法”诚然是排斥异己之见，但他的“侠以武犯禁”却道出了一定的真理：侠客行为往往与社会的稳定、社会的发展相乖离。

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侠义精神往往太个人化、太情绪化，往往被人利用。比如古代的那些刺客，大都是“士为知己者死”的。荆轲，是为燕太子丹报仇；专诸，是为公子光报仇；聂政，是为严仲子报仇；如此等等。有的（如荆轲）结合了国恨家仇，刺杀便成了“义举”；有的则纯属报答个人恩遇，属于一种“杀手”行为，几无侠义可言。有的则是坏人利用刺客去杀好人，那更是一种恶行了。于是，侠义精神、侠肝义胆之类慢慢衍变成了“侠义恩仇”、“江湖义气”（哥儿们义气、姐儿们义气），“恩仇”的比重越来越大，“江湖”的气息越来越浓，而侠义的成分却越来越小了。一种美好天性被“异化”、扭曲、变形了。时至今日，出现了世界性的道德大滑坡，权、钱、色交易弥漫世界各个角落，黑帮、邪教、杀手比比皆是，“侠义恩仇”、“江湖义